

政治理论教育参考资料

(十七)

解放军体育学院政治部政治理论教研室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

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

胡 华

1979·8

同志们！

很感谢，教育部和市领导上和同志们给我一个机会，和同志们见面，来做一个汇报性发言，和同行们交流意见，关于党史教学，大家提出不少问题，有不少是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情况问题。我作一点介绍，供参考指正。题目就是“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我不是全面地叙述这段历史，也不着重讲理论方面，而是根据看到的，访问到的材料，稍加整理，讲点有关的情况，供教员同志参考。不一定准确，讲错了的地方，请同志们更正。首先，谈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建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转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党的领导机构来说，建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1927年，7月8日左右，共产国际发来指示，将陈独秀免职，陈独秀当时也领导不下去了，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7月10日左右，由鲍罗廷主持，在汉口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把陈独秀隐蔽在一家文具店里，这是党的一个秘密机关，这时陈独秀也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这次会议，根据国际指示，改组中央，由瞿秋白负责，代替陈独秀的工作。因为瞿秋白在五大时，写过《第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第文章，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比较明确，比较有系统。临时中央由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蔡和森、张太雷，这几个参加。

七月十二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开始捕捉共产党人。七月十三日，临时党中央，发表了宣言，退出国民政府，痛斥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集团之后，叛变革命。不久，宋庆龄也发表声明，痛斥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

七月十日至十三日，临时中央一连开了几天会，主要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地点在九江、南昌一带。因为第二方面军中我党能掌握的叶挺为付军长的十一军和贺龙为军长的二十军，当时正东征到九江、南昌一带。这就是后来的南昌起义。

第二件事是决定四省秋收暴动，就是在我党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

鄂、粵、贛四省，举行秋收暴动。

第三件事是决定召开一个中央的紧急会议，就是后来的八七会议和六大上瞿秋白报告等历史文件提出“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就是这五个人临时主持了一段工作。

接着举行了“八一”起义，对于八一起义，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前委书记、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彭湃、叶挺等前委委员。七月十六日以后，派了李立三、恽代英、高语罕等到九江去了解情况，做准备工作，七月廿〇日，周恩来同志自武昌动身，到九江后开了会，决定去南昌起义。七月廿六、七号，周恩来同志到了南昌，与朱德、叶挺等同志策划起义。这时，七月二十三日样子，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到了汉口（格鲁吉亚人），瞿秋白也从庐山回来，七月廿六日，共产国际有电报给汉口临时中央，说：“暴动有把握，就进行，没有把握就不进行”。并没有一定叫停止起义。罗明纳兹和临时中央留在汉口的几个人开会，决定派张国焘到南昌去送信，但并没有派他去停止暴动。张国焘到了九江、南昌，主张联合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才能起义，张发奎是亲汪精卫的，联合张发奎起义是不可能的，张国焘这个思想，还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继续，被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同志坚决顶了回去。周恩来同志那时只29岁，领导了三万人的伟大起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革命气魄和高度组织才能。张国焘前些年在香港写的回忆录，把事情歪曲成为共产国际叫他去停止暴动，是不符合事实

的，（他后来在加拿大多伦多老人院，73、74年《参考资料》传说他死了，最近香港明报说他还未死，不过瘫痪了。上月加拿大林光达教授来说，他所说也没有死，准备回加拿大后去找一下）。

八一起义之后，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的地点现在在汉口已搞了个纪念馆。过去八七会议文件，写了个“于九江”这是为了迷惑敌人，并不是真在九江。就象六届三中全会是在上海开的，文件上写了个“于庐山”，也就为了迷惑敌人，所以我们看历史文献、历史档案，也要有鉴别，要和当时人的回忆结合起来看。“八七”会议是一个中央紧急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国际代表是罗明纳兹，由于是个紧急会议，北方区没有来人，主要到会的是两湖的、武汉的同志，毛主席、李维汉、张大雷、任弼时、蔡和森、罗亦农，和陆定一等都参加了，邓小平同志是秘书长。会议只开了一天，通过了一个《告全党党员书》，这个文件是罗明纳兹听了汇报后起草的。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在会上通过。毛主席在会上讲了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意见。大会也这样做了。毛主席讲：我们参加到国民党里去，是要做主人，不是去做客人。国民党好象是一所房子，我们是搬进去做主人，不是替别人抬轿子，过去这个问题上，认识上没有解决，所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放弃了领导权。《告党员书》中关于湖南十万农军包围了长沙问题，与事实有些出入。情况是：五月廿一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长沙我党机关工农组织受了袭击，湖南省委夏曦、郭亮，跑到武汉向中央请示，

省委一时没人负责，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跑到株州打电话给各个县农民协会，动员农军到长沙会师，浏阳中心县委书记潘心源同志，领着浏阳平江农军几百人有几百支枪和一些梭枪队宣传队进攻长沙，路上遇见中央来的李维汉同志，李维汉同志说，长沙许克祥有武装三千人，你们农民自卫军几百人进攻长沙怕不行，中央已派谭平山等一个考察团到长沙来处理了，你们是不是等他们来，等等中央的指示。这样，潘心源带平、浏农民返回去了。这就是“静候中央解决”的情况。当时，其他地方出发的农民，半路闻讯陆续也退回去了。当时，陈独秀反对打长沙，共产国际代表，也不要陈独秀打长沙，李维汉同志执行了他们的命令。当时如早把各地农军在平、浏一带集合。再进攻长沙就对了，单纯的要他们退回去，等候中央解决，这是不对的，失去了时机。但也不是十万农民包围了长沙，中央再下令叫退回去。这件事潘心源、柳直荀等同志当时向中央都有报告。

马日事变后，鲍罗廷和陈独秀想中央采用自上而下的和平办法解决。因为许克祥是唐生智的部下，所以陈独秀找汪精卫、唐生智商定，用武汉国民政府名义，派一个考察团去解决。由谭平山、鲍罗廷、唐生智的两个代表和国民政府的一个代表五人组成，到了岳阳，打电话给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斓联系，周斓回电报，说“请你们不要来”，周斓也是唐生智部下，电报措辞极不礼貌，谭平山、鲍罗廷等知道这是唐生智授意的，即使去到长沙，也解决不了问题。只好返回武汉了。

毛主席主张发动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斗争，请求回湖南去处理。陈独秀同意了派毛主席去主持湖南省委工作。毛主席去了十多天，积极组织群众。陈独秀不放心，又把毛主席调回来了。

七月初，由于武汉环境日益险恶，中央决定一些知名的领导干部离开武汉，分散到外地，陈独秀决定毛主席到四川去工作，毛主席坚持回湖南，毛主席在湖南认识他的人多，回去是危险的，但是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回湖南，七月中旬，武汉改组后的新的党中央派毛主席和罗章龙二人以中央委员身份去指导湖南省委工作。他们到长沙郊区赵家坪办公，省委还有夏明翰（就是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烈士）易礼容、滕代远、王一科、罗学赞、林蔚等人。毛主席到湖南后领导省委，派人恢复平浏、株州湘南的衡阳等地的工作。

八七会议前，中央来通知，叫湖南省委派人参加八七紧急会议，省委推举毛主席、彭公达前去参加。

毛主席参加八七会议回来后，召开了沈家大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由彭公达负责决定举行湖南秋收起义。关于这项省委会议，彭公达同志向中央有一个报告，会上也有争论，有的同志主张全省起义，有的同志主张主要在湘南起义，而毛主席主张在湘东、湘干边起义，最后大家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决定里应外合，夺取长沙，由毛主席担任前委书记，发动湘东的平、浏、安源、株州一带工农武装进攻

长沙，由罗章龙在长沙，负责一个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长沙城内外的工人武装和农民武装，破坏武长铁路、铁路交通，炸毁铁路桥梁，约定在九月中旬，当毛主席带队伍打到离长沙40华里的黄花市时，城内外工农武装发动起义，响应配合，拿下长沙。

但是到九月中旬，毛主席带领的秋收起义队伍在平、浏一带遭到挫折。毛主席把失败后的队伍集中在文家市，派人送信到长沙给省委，说起义队伍受挫折，决定不到长沙来了，长沙武装起义的工作可以停止。这样，毛主席就带队伍到霄山脉中段去开辟农村根据地了，后来十一月扩大会议瞿秋白把毛主席这次正确的退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批判为“退却逃跑”说他专凭枪杆子，撤消了毛主席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是在上海英租界西区静安寺路开的。瞿秋白、张太雷等主持，国际代表是罗明拉兹，到会有八七会议选的政治局委员和五大选的中委，共三、四十人，罗明纳兹作了政治报告，瞿秋白作补充报告，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要超越民主革命阶段，转向社会主义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全国都有直接革命形势，党的任务是组织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这就开始了第一次“左”倾路线。

在组织上，十一月扩大会议，一分为二，好的方面，恢复建立了中央各个部委，因为“七一五”武汉失败后，中央各部委都撤掉了，这时又恢复起来。恢复了工委（罗章龙负责），中央农委（彭湃负责）中央

军委（周恩来负责）、谭平山没有参加会，他活动组织农工民主党，因而开除了他。另外，十一月扩大会议在组织上错的方面，就是实行惩办主义，对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都用惩罚政策，受了处分，包括毛主席、周恩来都受了处分。

接着十二月，发生广州起义，因占据广州的张发奎主力，那时开离广州，同李济深打仗，广州城内只留下叶剑英为团长的一个教导团，有主力一千四百多人，内有二百人左右的一个党支部及团员城内还有二、三千人的秘密的赤色工人纠察队，张太雷等同志认为可以有把握起义拿下广州，由张太雷领导，叶挺、叶剑英、聂荣臻、贺昌、陈郁、邓发、周文雍等领导了起义。但是张发奎很快地反扑过来，加帝国主义炮舰在珠江轰击，起义军没有及时撤出，遭到了失败，后来只一部分队伍到了海陆丰根据地，对这个起义也一分为二，从主要方面，说利用敌人兵力空虚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斗争是非常英勇，可歌可泣的，打开监狱、解救被捕同志、缴获大量物资，拉起义队伍。但另一方面，起义主要领导张太雷同志、罗易曼没有考虑到起义胜利后，根据力量对比，是不能久占广州城的，应该迅速撤离广州，到海陆丰去，特别应该到五华、兴宁、梅县一带、粤北山地区，到那一带开辟粤北闽西根据地。当时叶挺、叶剑英主张撤出去，罗易曼、张太雷不听，自己很快牺牲了，周总理发动南昌起义时就决定撤出南昌，张太雷没有周高明，更没有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失败。

接着1928年2月的湘南起义，由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为主力，配合湘南特委起义，朱德的部队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宜章农军叫第二师，郴县农军叫第七师，师长邓允庭，湘南七个县农民起义，宜章、郴县、永兴、资兴、耒阳，加上安仁大部分，桂阳一部分，有一百多万人参加起义。

但湘南特委执行烧杀政策，郴县、耒阳县城被破坏。特委书记陈佑魁、宣传部长周鲁（即毛主席批评烧杀太多的那个人）共青团书记席克思，都执行“左”倾路线，也都牺牲了，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夏明翰的弟弟）被杀，敌人范石生、何健、许克祥等夹击，朱德派毛泽覃上井冈山同毛主席联系上，毛主席带兵接朱德同志部队撤退，上了井冈山，朱德有全付武装的主力，二三千人，加农军有七、八千人，大大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力量。

朱德主力撤退后，敌人在湘南残酷报复，在耒阳杀了一万多人，在永兴杀了三千多人。

1928年6、7月，党召开六大，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中国党到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各地区选派有代表性的工、农干部参加，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大农庄，原来是俄皇贵族的庄园里开会，到会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一百多名，还有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们列席，还有兄弟党代表如德国台尔曼等同志参加。

参加大会的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大中央委员，较大代表团有

广东代表团（苏兆征带队）北方代表团（王仲一带领）、武汉代表团（项英带队）、湖南代表团（罗章龙带队），还有江苏、安徽等地代表团。大会通知陈独秀到会，但他闹情绪，满腹牢骚，拒绝参加。

会议由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指导，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具体指导，布哈林作了政治报告，会议进行了二、三个星期。有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正确地确定了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临时中央的盲动主义，瞿秋白认为革命是高潮，受到批判，他承认了错误，张国焘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大家批判他追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如错误地处理三二〇事件和党务整理案等，布哈林说，看你身体是个大个子，可是你在政治上却是个小孩子，批评许多事都没处理好。

大会经各代表团酝酿后，提出了比当选人数多一倍的候选名单，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这是符合党章选举法的（不能同数选举，同数选举是不民主的），毛主席未到会，但被选为中央委员。

布哈林强调工人成份，因此选了些工人出身，但阶级觉悟并不高的一些人当中委，尤其是向忠发（武汉船工）当了总书记，这是不好的，因为他政治上不成熟，觉悟不高，革命品德也不好，但也选周恩来同志等为常委。

六届一中全会，在克里姆林宫内举行，当天晚上，斯大林亲自作了重要讲话，指出革命在两个高潮之间，工作做得好，新高潮就会到来，

给大家很大鼓舞，他要大家好好学习；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一中全会选了向忠发为总书记，李立三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周恩来常委兼组织部长、军事部长。把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等留下来，担任驻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党的精神面貌很振奋，工作也有发展，但六大以后，还存在“左”的倾向，就是强敌占城市后，对于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没有解决，城市工作中是发动斗争为中心，还是积蓄革命力量为中心，也没有解决。当时不要统一战线，不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资方一律斗争，对黄色工会也斗争，搞关门主义，对高级知识分子也排斥。

1930年4月，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去汇报工作，参加俄共十六次大会去了，李立三掌握了实权，向忠发是个工人，水平低、没有主意，这时，发生了立三路线、即第二次左倾路线。

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立三路线的表现有几个方面：

第一，对形势的估计，认为是新的高潮，可以发展到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由一省数省包括中心城市的首要胜利达到全国革命总爆发。由全国革命总爆发，引起世界革命总爆发，从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这被称为半托洛茨基观点，当时有利的历史环境是蒋、阎、冯新军伐中原大战，

各根据地和红军有相当发展、六七万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逐渐恢复，党员发展到六、七万人，城市大工厂有了些赤色工会，农村有了些支部有抗捐抗税斗争，反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一些工作，有士兵哗变等现象，李立三认为全国革命形势象布满了干柴，一点就燃。

第二，制订了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准备全国总暴动，用城市工人总暴动、武装起义，夺取上海、南京、武汉。同时要求各根据地红军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命令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打长沙，毛主席一军团打南昌、方志敏率红十军打九江，命令贺龙率红二军团从西湘鄂打武汉，徐向前、许继慎率红四军团从鄂豫皖打武汉，然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引起世界革命总暴发。

第三，把党、团、工会组织统一起来，成立总行动委员会，有江南、华南、北方、武汉等几个行动委员会。江南行委是李立三作书记，李维汉为组织部长，陈云同志管外线，华南行委是李富春负责，北方行委是贺昌负责，还有关向应同志，武汉行委是任弼时负责。

江南行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上海首先发动电厂工人罢工，结果一部分工人罢工，一部分工人被黄色工会把持没有罢工。和记蛋厂等工厂的组织被破坏。上海郊区和苏中、苏北、南通、海门、如皋、泰兴等几个县从一九二八年五月起就有游击战争，特委书记是刘瑞龙同志，一九二九年冬，中央派了李绍、黄火青、张爱萍等几位军事干部去建立红四军。三〇年六月，红军主力发展到一

千多人，三〇年八、九月，立三路线命令只有一千余人的红十四军“会攻南通，截断长江，攻进上海、南京”，九月初与一万多优势敌人打硬仗，而受了重大损失，在敌围攻下，经英勇斗争也失败了。安徽是李立三亲自去发动，也没有搞起来。南京我党只有一个支部，掌握国民党里很少一部分军事力量，派全国总工会一个委员去发动暴动，立三说，南京暴动胜利就是把蒋介石的头砍下来一样，结果这个支部和一点军事力量都损失了。

在白区，首先起来反对立三路线的是恽代英，他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因为反对立三路线，被降职为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并也要他到街上去撒传单，被抄靶子的巡捕逮捕，他把脸抓破，假姓王，敌人没有识破他，关在上海狱中，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叛变，供出了他，蒋介石诱降无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牺牲了。

何孟雄也是首先反对立三路线的，他连写了好几封信，反对立三计划，他九月八日写的政治意见书，今天来看也是很正确的。他认为立三路线脱离群众，不切实际是泛暴主义。他先是江苏省委书记，后是沪中区区委书记，他被批斗降职为江苏省委的干事。支持何孟雄的有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

罗章龙是全国总工会党团的总书记，也同何孟雄联合反立三路线，铁总的史文彬同志，海总的陈郁同志，张金保（纺总）等都支持。当时周恩来同志不在，到莫斯科开会去了。参加俄共十六大，李维汉同志曾

建议立三把六月十一日决议，请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请示一下。李立三很骄傲，说：等胜利后再向共产国际说话。国际代表有二个德国人，反对，但不起作用。

在苏区既遵守纪律又抵制立三路线的首先是毛主席，毛主席没有硬打南昌，扩大了苏区，打外围。七月下旬，彭德怀同志第三军团打下了长沙，选立三为湖南省主席，李立三更骄傲起来，由于何健反攻，三军团退出长沙，李立三要毛主席第一军团再次打长沙，提出打下长沙、武汉过中秋节计划一，三军团在浏阳会合组成一方面军，再攻长沙，从八月打到九月，毛主席说服了中央代表周以栗，打下了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开罗坊会议，说服三军团和彭德怀同志不打九江，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方针，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各苏区也如此。

一九三〇年九月，共产国际派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和周恩来同志回国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九月下旬在上海开了三中全会。当时共产国际只认为李立三是策略错误，瞿秋白主持三中全会也是这个调子，周总理的报告，对基本问题分析是制止了李立三这一套做法。李立三被调到莫斯科去学习。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中央又发了96号通告，指出立三是路线错误，不只是策略错误，反对调和主义。这时也取消了对何孟雄同志的处分。取消内奸、工贼、暗探，取消派等帽子。

一九三〇年冬共产国际派了东方部部长米夫到中国来做代表，他提出

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犯调和错误，领导机构不行，建议召开四中全会，改组领导。米夫本来兼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他在一九二六年在中山大学搞了个反托派，扩大化，他拉拢王明等29人，封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而把其余一千多同学打成托派或托派嫌疑，调和派等，中山大学办不下去，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王明等由米夫派回中国，米夫有意扶植亲信王明来夺权，王明就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召开四中全会。

王明是1929年冬回国的，王明回国后，他自以为有靠山，有来头，不服从组织分配，李立三认为他没有工作经验，应该分配到基层锻炼，分配他到浦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支部书记，他去了几天，害怕白色恐怖，提出不愿在基层工作，回到全总办公室工作，又不想干，要做理论宣传工作，分配到宣传部，后来当了《红旗日报》的记者。他抄了些斯大林的语录说写了本“两条路线”，他在党内散布流言蜚语，说：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理论，而列宁说“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过去一些革命都是机会主义的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现在他们这些懂得革命理论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回国了，中国革命要由他们来领导，才能掌握中国党的命运。他认为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右，中国党从陈独秀开始，都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污蔑毛主席为代表的在农村不真正是红色苏区，苏区是富农路线。要革命就要开展反右斗争。他发明了一种谬论，说立三路线是“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消极”，把“左”

倾错误和右倾错误混淆起来，把极左说成是右，只准反右不准反极左，这个发明权在王明，姚文元批林彪的右，不过是抄袭王明的谬论，拾王明的牙秽而已。姚文元虽然比王明还狠毒一百倍，但就马列教条和歪才来说，可以说连王明的百分之一也没有。让姚文元这样的黄浦滩上的流氓文痞“洋场恶少”，居然也来统治了我们这样大的党真是可悲，这才真是历史的误会。

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8日召开了四中全会。这个会是临时通知，突然召开的。米夫主持会议，他先作报告，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构，反对调和主义瞿秋白为首的三中全会，并推荐王明，博古，沈泽民等几个人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夫说这是国际的决定，请大家通过。米夫以为用共产国际的名义问题不大，但会上大部分同志不赞成，包括六大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海总，铁总的同志，江苏省委等白区地方组织的代表没参加四中全会的苏区代表（1930年五一，在上海开了个全国苏维埃准备会，简称苏准备，即毛主席、贺龙等地区派来的人，有38个正式代表，二、三十个工作人员，苏准会代表三十多人都不同意米夫提名王明为政治局委员，集体退席。何孟雄、罗章龙等都长篇发言反对王明当选。会场争吵起来，意见不能统一，最后由米夫裁决，宣布新中央成立，通过王明等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把新参加会的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康生等赞成票，算正式票，别的老中央委员合法的反对票不算数。

过了几天，一月十三日样子，米夫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心里不踏实，又召集四中全会上不同意王明当选的同志二、三十人，开了个会。会场布置在上海英租界沪西的一个花园洋房里，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叫“花园会议”。米夫又亲自主持会议还有两个国际代表和翻译参加。米夫说，你们对国际推举王明任政治局委员想不通，但王明是马列理论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你们要信任他的领导，中国党才能实行新的路线。说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并且说，虽然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占多数，但形式的多数不能算多数。

但这个会上，六大一些老中委和干部们发言，仍然认为四中全会不符合党章党纪，认为少数人赞成是不合法的，王明脱离实际，没有工作经验，不能领导，不同意王明等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主张召开七大或中央紧急会议。大家还是抵制、争论，会开不下去，米夫等很恼火，最后，由国际代表当场宣布，你们这些人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反国际应该处分，一律开除。

花园会议后，临时中央就宣布开除了罗章龙、何孟雄等的党籍。后来因何孟雄等在一月十七日被捕了，没有做。

于是这些被开除的人，一面写信向共产国际告状，一面拒不交出组织，搞分裂继续在全总工会机关和江苏省委等单位工作，并暂时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叫“非常委员会”，由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罗章龙等担任常委。